

1960年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

“不惜一切代价”

第三次高山行军超额完成了预定计划,然而,这次行动损失也不小。第二次行军时,来自兰州大学从事水文研究的青年队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,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;这一次,来自北京大学的气象专业队员邵子庆也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。并且,队员们返回大本营后,全队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,且大部分都是登顶希望最大的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。最后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派来一个六人医疗组,才算解了燃眉之急。

残酷现实引起了登山队的不安,进山以来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营,一时陷入了沮丧的低潮。恰在这时,珠峰的天气也变了,山峦间升起浓雾,天气渐渐转暖,这意味着,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,一旦连绵的雨季

来临,就只能等下半年九月份或来年再战了。

备战一年多的攀登计划,难道真的要就此中断吗?

在沮丧、焦急的情绪中,传来了北京的命令:“要不惜一切代价,重新组织攀登。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,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!”

总理对登山的关注,不仅是因与印度的登山竞赛,还与我国正与尼泊尔谈判的中尼边境划界问题有关。当时,双方关于珠峰的归属问题存在争议。1953年,尼泊尔籍的丹增·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,从南坡成功登顶珠峰,尼泊尔对此大肆宣扬,其目的不言而喻,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,怎么能说是你们的?

正是这样的背景,使得攀登珠峰的登山队员们,陡然间肩负了一项庄严的国家使命。

5月13日,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。5月17日北

京时间9点半,隆重的誓师大会后,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轻装出发。翁庆章至今记得,出发前王富洲到医务室向他告别,只说了一句话:“我这次豁出去了,如果上不去,我也就不回来了。”

抱着这样的决心,经过几天艰苦而快速的行军,5月23日下午2点,许竞一行四人顺利到达了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。几个人支起帐篷略作休整,当晚,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、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。那时,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摔掉,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,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:“24日为好天气。”

尽管如此,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向前。根据事先安排,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,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。不料,24日早上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,组长许

竞就倒下了。从登山队进山至今,他一直负责开路,体力消耗实在太多了。无奈,组员们只好把许竞扶进帐篷休息,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,运输队员屈银华临危受命,成为新的突击队员。

海拔8500米高度的氧气实在太稀薄,四个人从17日连续攀登至今,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,只能一步一步地缓慢前行。大约2个小时后,四人才来到了通往珠峰的最后一道难关——“第二台阶”处。

“第二台阶”总高20多米,相当于一栋七八层高的楼房,其下部较陡,但还能找到攀附点或支撑点,最困难的要数最上部的4米多,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光滑岩壁。第三次行军时,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,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路线,并没有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。

王富洲一行终于来到了“第二台阶”的中上部。面对4米多高的岩壁,刘连满用尽全身的力量尝试攀

登了4次都没能成功。贡布和屈银华也分别试了2次,结果同样是跌回原地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,四个人着急得不行,终于,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。他主动蹲下当“人梯”,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攀登。屈银华先上,他实在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,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,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也上不去,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,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、攀爬……这个过程不过短短一个多小时,屈银华的两只脚趾和双足跟就被彻底冻坏只能切除……蹲下当“人梯”的刘连满同样不容易,这样的高度,任何一个轻微的动作,都会给身体带来沉重的负担,刘连满却要用身体托着100多斤的队友慢慢站直,足足坚持一个多小时,可想而知,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!到下午5时,平原地区或许

不起眼的4米多岩壁,竟然耗费了他们三个多小时。

来不及歇息,片刻后四个人继续结组前进。这时,长时间在前面开路的刘连满体力越来越虚弱了,一连摔倒了十几回。在海拔8700米处又一次摔倒后,他挣扎再三还是没爬起来,其余三人只能将他安置在一处避风又不会发生坠岩危险的地方休息,并把所剩无几的氧气留下一瓶,准备回程时再来接他。

安顿好刘连满,已经是北京时间19点左右,由于时差的存在,珠峰上还有光亮,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,如果继续前进,就意味着要摸黑行军了,此前,中国登山队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。前进?后退?还是原地休息?与大本营失联的三个人没有考虑太久,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,很快取得共同意见:只能前进不能后退,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!⑤

(据《北京日报》)

反对足球的作家们

足球是一项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,具有高度的娱乐性,同时也往往寄托了个人或集体的多种感情。商业机构则竭力把足球装扮成一项超越国界、阶级、语言、肤色、四海咸庆、五洲同欢的和平运动。但并非所有人对此认同。某些大作家,如奥威尔、帕慕克、伯恩哈德,都曾从中清醒地看到嫉妒、仇恨、民粹主义与政治狂热,因此或明确地反对足球,或委婉地提醒我们保持警惕。当然,他们的担忧或警告不会改变什么。足球从未降低它受欢迎的程度,也从未减缓它在市场上扩张的速度。

奥威尔:体育经久不衰地制造恶意

1945年,在论及莫斯科迪纳摩队访英比赛时,英国大作家乔治·奥威尔指出:“体育经久不衰地制造恶意,如果这样一次来访对英苏关系有什么效果,那也只能是雪上加霜。”

在这篇名为《体育精神》的随笔中,奥威尔写道:人们说体育能在国家之间创造友好,还说世界上不同

国家的平民如果能以足球或板球相遇,便无意兵戎相见,每闻此言,我总觉惊奇。即使不看前车之鉴(如1936年奥运会),不知道国际比赛足以演变成倾泻仇恨的大联欢,你也能从基本的准则中得出同样的推断。

如今,几乎所有体育运动都是竞争性的。你比赛是为了取胜,如果不曾竭力争胜,那么比赛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在乡村草地上,你为两方加油,感受不到地域提醒我们保持警惕。当然,他们的担忧或警告不会改变什么。足球从未降低它受欢迎的程度,也从未减缓它在市场上扩张的速度。

在英格兰,对体育的痴迷已经足够糟糕了,可是在

一些年轻的国家,即使那里的比赛和民族主义都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,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热情。在印度和缅甸等国,足球比赛必须由警察组成强有力的警戒线,以防止群众冲入球场。在缅甸,我曾看到一方的支持者在关键时刻冲破警力,让对方的守门员丧失了功用。大约十五年前,西班牙举行的第一场大型足球比赛导致了无法控制的骚乱。一旦激起强烈的竞争感,按照规则比赛的观念必然消失不见。人们想看到一方问鼎,另一方蒙羞,他们忘记了通过作弊、通过群众干预而得来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。观众即使没用身体来干预,也会试图通过为己方的球队加油、用嘘声和辱骂“欺负”对手来影响比赛。严肃的体育运动无关公平竞赛。与它密切相关的是仇恨、嫉妒、自夸、对一切规则的漠视,以及目睹暴力时所产生的虐待狂般的乐趣:换句话说,这就是战争,只是减去了射击。

帕慕克: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

土耳其大作家奥尔罕·

帕慕克和他父亲一样,是伊斯坦布尔球会费内巴切的支持者,几十年后还能“像背诗一样,背出1959年费内巴切队的整个阵容”。但他对这项运动有着清醒的认识。

在1990年的小说《黑书》手稿里,帕慕克写了一个走遍伊斯坦布尔找老婆的人,听到收音机里正在播土耳其主场惨败给英格兰的比赛,只听见英格兰人一个又一个地进球。“1980年代,土耳其以0比8输掉了对英格兰的两场重要的资格赛。英格兰队员在场上嘲笑我们的球员,英国报纸拿我们打趣,因为在伊斯坦布尔的首场比赛时,我们甚至连一块像样的草皮都没有。对我来说,这些失败正是国家以及耻辱感的隐喻。最后,我把这些段落删掉了,好让书薄些。可现在在我后悔了。”帕慕克告诉《明镜》周刊。

他还说:“葡萄牙过去的独裁者萨拉查也把足球用做控制国家的工具。他视比赛为大众的鸦片,以此保持稳定。要是在我们国家也能这样,那倒也不错。在这儿足球不是鸦片,而更像是一台制造民族主义、仇外症

和专制观念的机器。我还相信,失败会催生民族主义,而胜利并不能……民族主义滋生于灾难……现在的土耳其足球是为民族主义而不是为民族服务。”

伯恩哈德:具有娱乐性并使人神志不清

奥地利大作家托马斯·伯恩哈德在其自传体小说《原因:一种预示》中,把他在青少年时代就读的、深受纳粹统治影响的寄宿学校视为一座“精心设计的、无耻地摧残他思想的牢笼”,校长格林克兰茨形同典狱长,体育则是掌权者的工具。伯恩哈德写道:在这座城市的混乱中,我仍在上我的小提琴课,我们每周四傍晚仍必须穿上制服到体育场上,在铺有炉渣的跑道或草地上接受格林克兰茨的训斥。我只有的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印象,当然只是很短的时间:在每年一度的体育比赛中,我在五十米、一百米、五百米和一千米的赛跑中都是不可战胜的;当我赢得比赛时,曾两次站在格林格勒体育场专门为胜利者的颁奖

仪式搭建的颁奖台上接受颁奖……我从来对任何一项体育运动都提不起兴趣,是的,我总是痛恨体育,我现在仍然痛恨体育。在任何时期,尤其是所有的政府都有充分理由一直赋予体育最重要的地位,它具有娱乐性并使人神志不清,变得愚笨,尤其是独裁者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而且无论如何都支持体育。支持体育可以得民心,而支持文化则失民心,这是我外公说的,因此所有的政府总是支持体育而反对文化。和所有的独裁统治一样,纳粹统治也是通过大众体育变得强大,几乎统治了全世界。在所有的国家中,大众在任何时候都受到体育的管束。无论那个国家多么渺小和不重要,但把一切都奉献给体育天经地义。然而,从数百名在战争中身负重伤、大多数几乎完全残疾的人身边走过,前往格林格勒体育场为了赢得奖章而奔跑,这是多么的荒诞啊!而他们却在主火车站如同一件完全令人生厌的、包装残缺的商品被装入另一个车厢。

(据《中华读书报》)